

毛共與印共——一九六五至七二年

默山

前言

毛共文革後，對第三世界共黨運動的策略，特別強調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模式」，也就是西方學者所說的「毛澤東的模式」。其實這一觀念的首次出現，是當初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劉少奇所提出，一九四九年在北平所召開的亞洲澳洲工會會議的開幕詞中，劉少奇公然聲稱：「武裝鬥爭則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主要鬥爭形式。這就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在國內所實行的基本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這條道路也可能成為情形類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

①。在一九五五—五九年間，是毛共對亞非國家採取「和平」攻勢強調「和平五原則」的時期，因而在對外政策上儘量避免提到「毛澤東道路」，以便爭取亞非國家的好感。但是到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毛共政權成立十週年時，毛共與蘇共對世界革命策略趨向公開分裂之際，「毛澤東道路」的世界革命「模式」再度受到重視，劉少奇在一篇紀念性的文章中，聲稱毛共的「革命道路」，應作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主義革命的典型②。文革開始以後，這一「模式」在毛共對外關係上佔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毛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中重述了毛澤東革命戰略：「當前正處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各種政治力量正在經歷着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局面。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特別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運動正在蓬勃展開」③。從此，毛共對緬甸、印尼以及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開始大而直接地介入。從八月份起，毛共官方報刊和廣播不斷發表印

度革命的文章，用以挑撥政府與學生、公務員、工人、商人、農民、知識份子以及從極左到極右各黨派與執政國大黨的關係，製造印度的階級矛盾和革命風暴。同年秋天，毛共利用印度學潮，認為這是印度革命情勢發展的第一顆火花④，在一項定向廣播中稱：「學生史無前例地大舉反抗國大黨的反動

印共分裂前後毛共與印共的關係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二日，印共總書記高希(A. Ghosh)逝世，黨內失却中心。同年四月底，印共全國委員會選出丹吉(S. Dange)為主席，南布迪里巴德(E. M. Namboodirpad)為總書記。同年十月，毛共與印度邊界衝突爆發，該黨於同月卅一日召開緊急會議，會中南布迪里巴德拒絕簽署丹吉所提之「中國(共)侵略引起的國家緊急時期」之反毛共決議⑤，印共內部出現兩派分裂的陰影，並開始互相鬥爭。一九六四年底，兩派各自宣稱是印共的正統，並分別召開七全大會，從此實際上已分為兩個獨立的政黨。丹吉派一般稱為「右派」或「親俄派」，仍然延用印共(CPI)的稱謂；其反對派改稱印共馬克思派「CPI(M)」，即所謂之「左派」或「獨立」或「不結盟」共黨。

印共分裂後，右派共黨(CPI)和執政的國大黨雖然都指責印共馬克思派是個親毛共的集團⑥，其實該黨在毛蘇共衝突問題上僅對毛共作有限度的支持，而且是單方面的，為時極為短暫的。至於毛共雖然想盡辦法拉攏左派共黨，可是對於該黨的戰略與策略則從未有所報導。事實上該黨領導階層的思想並

不統一，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仍然搖擺不定，對毛共採取若即若離、不即不離的態度。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印巴爲克什米爾發生戰爭期間，毛共會對印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拆除錫金與毛共邊界的軍事設施，印共右派立即指責毛共是「機會主義」^⑭；相反的，印共左派則認爲這是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建議政府立即與毛共以談判解決邊界問題^⑮。在毛蘇共論爭期間，右派完全支持俄共的立場；左派一方面表示它的中立，另一方面則是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因此很少批評毛共。在毛共第一次從事原子試爆後，右派曾加以嚴厲譴責；左派則未加微詞，但是也沒有像尼泊爾和錫蘭共黨那樣的致送賀電。

一九六六年印度舉行第四次大選的前夕，各政黨開始策劃競選策略，印共左派決定籌組一個不包括右翼政黨在內的「反國大黨」聯合戰線；右派也考慮組聯合戰線來打擊執政國大黨。這兩個黨派在面臨共同敵人時，左派共黨開始重新估量其激進的政策。一九六六年底，印共馬列主義派改變對內策略路線，同意右派的「和平過渡」的議會鬥爭策略，至此，印共左右兩個黨派的實際政策已無顯著的差異，左派的領導人認爲，議會鬥爭是助長革命目標的手段，這一自我解釋並沒有太大的說服力，雖然它在對外政策上，仍然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而事實上自己也難免落入「修正主義」的窠臼^⑯。

一九六七年初的大選結果，印共馬克思派在克拉拉（Kerala）和西孟加拉（West Bengal）兩邦取得政權，這項成就顯然是該黨與右派共黨和其他中產階級政黨聯盟的成就，也是拒絕毛共那套毛澤東革命「模式」的結果。毛共在極端失望之餘，於一九六七年四月，透過北平電台宣稱：「印度沒有共產主義政黨，只有個別的共產黨人」^⑰。同年五月七日新華社電訊稱：「丹吉叛徒集團所鼓吹的，只不過是老牌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和現代修正主義者黑魯曉夫之流的陳腔濫調」，「不經過人民革命，不用暴力奪取政權，不打碎舊的國家機器，絕不可能改變社會制度和政權性質」^⑱。從上述指責看，印共馬克思派領導階層首次被中共形容爲修正主義，毛共還警告該黨，不可依賴議會路線，應當從事武裝鬥爭。

印共親毛派的崛起

毛共與印共

事實證明，印共馬克思派在印度克拉拉和西孟加拉兩邦的統治權非常薄弱，所有重要決策都由中央政府決定，而且只要中央政府認爲必要，它可以用「總統統治」的名義，接管邦政府的全部職能。印度共黨馬克思派的領導人只注意到利用議會政治來得到革命所得不到的果實，而忽略了印度中央政府是亞洲國家中最有權力的政府。對毛共來說，尚可告慰的，就是所謂的印共內部還有「個別的共產黨人」，也就是指西孟加拉邦和安德拉（Andhra Pradesh）邦的親毛極端份子，他們反對黨中央的議會路線，認爲武裝鬥爭是奪取政權的唯一方法。

一九六七年春，印共馬克思派的親毛份子，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嶺（Darjeeling）縣西里古立（Siliguri）鎮的納薩爾巴里（Naxalbari）地區，進一步領導和組織農民發動武裝鬥爭，聲言「要走中國革命的道路」，這就是印度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納薩爾特（Naxalites）運動。經過兩年的活動和協調，納薩爾特才脫離印共馬克思派，成立印度的第三個共黨，也就是印共馬列主義派（CPI (ML)）。

納薩爾特份子領導的叛亂方式，首先是懲罰農民發動反政府示威，然後煽動農民抗稅、抗繳租金、鬥毆警察、焚毀車站、襲擊地主住宅、盜竊武器、縱火、暗殺、搶劫，並自設「人民法庭」，審判地主、高利貸者和反共人士，並且進一步，由共黨份子建立「赤區」以抵抗中央。這一股新的叛亂組織，大大地違背印共馬克思派的議會道路，使該黨領導階層感到極爲棘手，而北平曾指責印共右派爲修正主義，左派爲新修正主義，現在對於納薩爾巴里地區的武裝叛亂發展，感到極大的興奮和滿意。北平的廣播形容這一鬥爭爲「印度人民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點燃了武裝鬥爭革命的強力火花」，同時廣播還抨擊印共馬克思派爲「印度反動派欺騙人民的工具」^⑲。「人民日報」社論還以「印度的春雷」來形容納薩爾巴里叛亂，認爲「印度革命的特點，同中國革命的特點一樣，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武裝鬥爭的道路，是印度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舍此沒有任何其他的道路」，所以毛共還表示「印共革命派做得對，做得好！中國人民爲印度大吉嶺地區的農民革命風暴而熱烈歡呼！」^⑳。

毛共全力支持納薩爾巴里的叛亂，使得印共馬克思派遭受很大的困擾。如果它領導的西孟加拉邦聯合政府要想打擊革命派，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

請中央政府直接干涉西孟加拉事務，其結果只有解散聯合政府之途，可是毛共爲了打擊印共馬克思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指出「丹吉叛徒集團和一小撮印共修正主義頭目們，都在起勁地誹謗和攻擊印共革命派和大吉嶺革命農民的偉大壯舉」^⑭。於是在毛共不斷地支援納薩爾巴里聲中，西孟加拉聯合政府，採取了武裝警察鎮壓的激烈手段，毛共針對這一問題而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評論員的文章，指出「納薩爾巴里農民的革命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還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粉粹敵人『圍剿』的嚴重鬥爭，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挫折。但是，納薩爾巴里的農民革命武裝只要堅決走中國革命的道路，把武裝鬥爭的紅旗高高舉起，就一定會推動印度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勝利」^⑮。八月三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特命甘納的歷史教訓與「走中國革命道路以農村包圍城市」兩篇文章」^⑯。七月卅一日，毛共代「參謀總長」楊成武在建軍節招待會上，曾讚揚印度革命派所領導的武裝叛亂^⑰，九月五日發表「印度農民用鮮血換來的經驗」。由上述毛共公開支持印度農民武裝暴亂的言論來看，顯然納薩爾巴里運動，並非單純的印度內部問題，而是中共有意唆使印共馬克思派中的極端份子，企圖推翻該黨的領導階層，奪取黨的領導權。

印共馬克思派的「兩條路線鬥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印共馬克思派中央委員會，在馬得拉斯 (Madras) 邦的馬杜雷 (Madurai) 集會，開始對毛共的宣傳攻勢展開反擊，會中就意識形態問題，採取了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重大決定，這一會議無論在印度內部情勢，甚至國際共黨運動方面，都有莫大的重要性。

談到印度的國內情勢，印共馬克思派與毛共的看法顯有很大的差距，前者力主以和平改革的方式來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一位該黨的發言人，針對中共對納薩爾巴里路線的合法性提出了批評說：「中共唆使納薩爾巴里的農民武裝暴動缺乏馬列主義的理論根據，而且與印度政黨發展的歷史背道而馳」^⑱。該黨中央委員會還否定了毛共所謂的印度執政國大黨是帝國主義的替身，印度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在分析國際共黨運動的情勢時，承認修正主義已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方向^⑲。

當一九六七年底，印共馬克思派向中央政府建議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時

，北平曾加以嚴厲的批評，並且再度強調武裝鬥爭策略的重要性。該批評說：「土地革命是當前階段印度新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在這種革命過程中，農民武裝暴動乃不可避免之事實」^⑳。

在檢討一九六七年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時，中共稱之謂「印度革命的轉捩點」。我們如果進一步以毛澤東思想的經驗來分析印度的共產主義運動，不難發現印共與毛共一樣有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毛的路線是正確的，劉的路線是錯誤的——毫無問題的，毛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模式」也適用於印度共產主義運動，按它的邏輯分析，印共右派與左派的領導階層採取的是修正主義路線；以武裝暴動爲策略的毛派革命份子代表正確路線。有一篇文章，特別指名西孟加拉邦副首席部長喬蒂·巴蘇 (Joyti Basu) 和克拉拉邦首席部長南布迪里巴德爲頭號「修正主義頭子」^㉑。

北平之所以指名攻擊這兩位印共馬克思派的領導人，其原因不僅因爲他們的所領導的邦內極有盛名與聲望，而且都曾領導對革命派的圍剿任務，同時他們也是重估對毛共立場的主要負責人。因此，在北平心目中，他們是當權派，是印共中的「劉少奇派」，應該加以鬥倒、鬥臭。

在毛共大力支持下，印共馬克思派內部的革命派在一九六七年底開始抬頭，在許多邦內紛紛成立納薩爾特組織，有些還奪取了黨的領導權，甚至於這些毛派組織曾在加爾各答召集了一次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思想」爲指導的策略方針，同時還出版刊物來宣揚「毛澤東思想」。到了一九六八年初，該黨的年輕幹部大多叛黨，有些地區的比率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致使該黨中央感到非常恐慌，更由於黨在對付這些叛黨份子時，所運用的方式錯誤，不僅未能收到團結的功效，反而導致了黨的公開分裂，而革命派也開始了組織工作。

第三個印度共黨的成立

印共馬克思派對黨內的革命派，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手段，試圖彌補黨的分裂。一九六七年八月在馬杜雷召開的中央委員會，討論通過的思想路線宣言中，就曾加入若干親毛共的觀點，想以此來安撫黨內的革命派，可是革命派並未接受此項妥協；該黨中央接着想在若干邦內整肅幾位特殊的革命派頭

頭，以收團結之效，結果反而鑄成大錯，促成了黨的加速分裂。

事實上，毛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至十二月的態度轉趨激烈，是促使印共革命派脫離修正主義路線，建立新政黨的主要因素，我們可以在許多文章和廣播，以及革命派發行的刊物中看出這一徵候。例如英文「北京周報」在一篇「論印度糧食問題」的文章中說：「唯一能解決印度糧食問題的方法是，在『真正的共產黨』領導下從事革命」²⁶；革命派在加爾各答出版的「解放」(Liberation)月刊，不斷地闡揚「毛澤東思想」和毛共的革命理論。

一九六八年底，印共馬克思派所領導的西孟加拉聯合政府內部因意見不合而發生政治危機，邦政府各機構呈現癱瘓狀態，印度中央政府運用憲法權，解散了聯合政府，中共抓住這一機會，強調其所謂的「共產主義者不能透過資產階級的選舉程序來獲得政權」，同時還呼籲親毛派革命份子抵制新的選舉，迫使選舉一再延期至一九六九年二至三月間方始舉行。該項選舉結果，印共馬克思派再度獲得組織聯合政府的機會，顯然該黨所謂的議會鬥爭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仍有莫大的價值的理論，是西孟加拉邦人民所選擇的道路，中共對此並沒有提出任何自圓其說的解釋，唯一可選擇的方向，就是為第三印共的催生而努力。

當第三印共的前身「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on Committee)設在西孟加拉邦的總部和安德拉邦支部發生分裂後，印共革命派於一九六八年組織了「共產黨革命派全印協調委員會」(All-India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y)，於是革命派即具有共黨的雛形，這個「協調委員會」曾多次商討印度革命所應取的戰略和策略，他們對於革命的方針差不多是一致的，認為「現階段印度革命的性質，是以土地革命為主要內容的人民民主革命，作為革命領導者的工人階級的責任，是在團結農民這一股革命的主力，進而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革命的共產黨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可是這一革命集團對於「毛澤東思想」的解釋和看法並不相同，因此並未釐訂出一套共同的政綱。其主要的原由，是西孟加拉集團的領袖桑雅爾(Kanu Sanyal)和安德拉集團的領袖里狄(T. N. Reddy)爭奪領導權的原故。結果西孟加拉集團在其他毛派的支持下，經中共的授意，成立了第三個印度共產黨²⁷。

一九六九年五月一日，桑雅爾在加爾各答發動萬人手持毛語錄大遊行之

後，羣集在梅頓廣場慶祝國際勞動節。桑雅爾在會中宣佈印度第三共黨的成立，此即印共馬列主義派(CPI(ML))。他在演說中宣稱：「我們的黨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難忘的紀念日，四月廿二日偉大的列寧百週年誕辰紀念日成立的。我們的黨是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下召開的中共九大期間誕生。我確信偉大的印度人民必會熱烈地迎接這一日子到來……」²⁸。

毛共對於這個無條件接受北平領導的第三印共，表示了特別歡迎之餘，對於其他拒絕參加新黨的毛派小集團和納薩賴特，並未忽視其存在的價值，因此它一方面承認第三印共是印度「真正的共產黨」；另一方面對其他毛派集團仍給予支持，其原因很可能是怕這些集團重回所謂的印共修正主義的陣營有關。毛共對其他毛派集團的稱讚和支持，可以從許多文章中得到引證，例如有一篇評論印度毛派份子在農村活動的文章中說：「印共馬列主義派和其他印度革命派，在階級矛盾尖銳地區，作了適當的工作，都表現了革命的精神」²⁹。因此這一階段北平對印度共黨的策略，是支持印度各毛派黨和集團，分化其他兩個所謂「修正主義」黨派，並盡可能地設法在各地發動武裝鬥爭。

第三印共的失敗

自從第三印共成立後，其內部一直存有許多困擾，同時在聯合第二印共的背叛者和其他親毛份子的工作上也沒有獲得成功。於是第三印共所主張的武裝奪取政權的政策，被各小型游擊組織用以消滅各種階級敵人，於是地主、放高利貸者、警察和第三印共黨員和幹部都被視為「階級敵人」而被迫從農村向外逃亡，遂使農村的統治機構被打爛，農村慘遭赤化，毛共式的「革命委員會」一一宣告成立。

另一方面，安德拉邦的革命共黨委員會主張以土地革命計劃和建立以羣眾為基礎的「赤軍」開始從事「解放鬥爭」。里狄集團把桑雅爾和馬鍾達(C. Mazumdar)集團主張的「盲目暴動」視為「蓋瓦拉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相信武裝鬥爭必須先武裝思想。雖然里狄領導的安德拉集團篤信毛澤東教條，但是毛共所承認的共黨却是桑雅爾和馬鍾達集團領導的第三

印共。

一九七〇年初，第三印共在馬鍾達領導下，武裝暴動的重點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尤其着重在西孟加拉邦的各城市，於是工業家、法官、國大黨黨員都成了「階級敵人」。然而在大肆屠殺第二印共黨員的殘酷行動上，不僅使第三印共內部意見不一致，而且也引起了印度政府的報復，致使該黨遭到了悲慘的圍剿而大傷元氣。在這種情況下，毛共對馬鍾達的領導方式、工作方針和策略概念作了無情的批評，毛共認為馬鍾達大着重城市工作而忽略鄉村工作，此其錯誤一也；在一九六七至六九年間，未能將當時在鄉村地區的成功加以鞏固，此其錯誤二也；他犯了過份「中央集權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毛病，此其錯誤三也^②。

第三印共受到毛共批評後，在一九七〇年中期恢復農村為重點的策略運用。同年年終該黨孟加拉邦委員會分裂為二，馬鍾達集團指責以卡特吉（Ashin Chatterji）為首的分離集團為「修正主義」，因為前者確信以農民暴動的手段來建立「解放區」這一毛派戰略的教條^③。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卡特吉在赴比哈爾邦某處出席黨中央委員會時被政府逮捕，該次會議不僅卡特吉無法參加，馬鍾達也未按時出席，於是會議在十一月七日以追隨「托洛斯基冒險主義路線」之罪名，開除馬鍾達的黨籍，另選比哈爾邦黨部書記辛格（S. N. Singh）為總書記。印度政府自一九七〇年起開始圍剿非法的第三印共，再加上該黨內部意見分歧而告分裂，因此納薩賴特運動自一九七一年四月至六月間開始沒落，隨後即加速崩潰。據報導，一九七二年二月間被捕入獄的納薩賴特份子，在西孟加拉邦有四千人左右；比哈爾邦有二千餘人；安德拉邦約一千四百人；克拉拉、猶他和其他各邦約千餘人。許多迷途知返的納薩賴特份子，紛紛重回西孟加拉與克拉拉兩邦的第二印共總部，也有投靠在安德拉邦的第一印共陣營者。據一九七二年八月五日紐約時報報導稱，一年來被捕的納薩賴特份子約二萬人，與警察發生戰鬥而死亡者數百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里狄在馬德拉斯被捕，罪證俱全被判四年牢獄。次年初桑雅爾被捕，與其他納薩賴特頭子同嘗鐵窗之味。同年七月十六日馬鍾達與另一中央委員等一千元在加爾各答被捕，此時西孟加拉首席部長即認為納薩賴特運動已被政府全面壓制。

雖然馬鍾達的若干親信仍逍遙法外，許多納薩賴特組織仍然相當活躍，但是在缺乏領導的情況下士氣極為低沉。他們為尋求團結，正逐漸放棄其「清算階級敵人」的策略，而且也揚棄暴力路線，希望以各種可行的方法來揭發政府政策的階級性。

結論

一、俄國革命會引起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們在思想上的幻想，而毛共竊據中國大陸後，並未引起類似的衝擊，因此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策略都源自俄共，其主要原因乃是，印共的領袖大多是城市中產階級出身，其本質與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相仿，主張以和平的議會鬥爭來奪取政權。

二、毛共文革期間，對印度輸出「毛澤東思想」，企圖將農民革命的「模式」強加於印度，可是毛共對印度的「革命情勢」估計過高，同時對印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缺乏深刻的瞭解，以致印共的農村武裝暴動所建立的根據地，僅局限於若干遙遠的邊區，也就是鄰近中共、孟加拉、錫金和不丹的山區，始終沒有更大的擴展。誠如第二印共的一位理論家科納（H. Konar）所說的，印度的農村和經濟缺點雖多，但是要動員農民仍有許多困難，因為各邦有其獨特的社會背景、政治傳統和階級制度；印度中央政府是亞非國家中權力最大的國家，憲法上規定中央有權於必要時解散邦政府^④。

（三）在一九六七年到七〇年間，印共革命派的暴力路線在印度共產主義發展中的確發生很大的衝擊力，對農村無產階級也發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同時還促使兩個正統的印度共黨「重視農村無產階級」，「在遙遠的邊區從事土地革命」，「保障了農民的收益」^⑤。

（四）印度第三共黨和納薩賴特運動，雖然在一九七二年底已經受到壓制，可是極左派在印度與孟加拉以及中國大陸邊界的活動時有所聞，今後印度政府如無法根本解決土地問題和糧食問題，則印共親毛派仍有可能在遙遠邊區死灰復燃。但是印共馬列主義派想走毛共以「槍桿子出政權」的毛澤東道路，以武裝奪取全國政權，在目前印度政治情況下，很難獲得成功。

註①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註②劉少奇「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第一期「紅旗」第十五頁。

註③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註④“A Maoist Line for Indi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33, January-March 1968.

註⑤Evening English Transmission, Oct. 8, 1966.

註⑥Late Evening Transmission, Oct. 10, 1966.

註⑦Late Evening Transmission, Nov. 14-15, 1966.

註⑧Evening Transmission, Dec. 10, 1966.

註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註⑩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新德里廣播印度內政部長南達(G. Nanda)稱左派共黨受中共指使，充當反印度的工具，在思想上並受中共的領導。

註⑪Patriot (New Delhi), Sept. 19, 1965.

註⑫Hindustan Time (New Delhi), Nov. 11, 1965.

註⑬“Peking and Indian Communism Since 1965,”

Current Scene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March 15, 1970, Vol. VIII, No. 6.

註⑭Quoted in Link (Weekly), Delhi, April 23, 1967.

註⑮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人民日報」。

註⑯NCNA, June 28, 1967.

註⑰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

註⑱同前註。

註⑲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

註⑳一九四六—五一年間，印共曾在特命甘納地區發動武裝叛亂，後因丹吉等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向印度政府讓步，此一暴亂遂自行瓦解。

註㉑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

註㉒Asian Recorder (New Delhi), 1967, p. 7907.

註㉓Ibid.

註㉔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人民日報」。

註㉕Peking Review No. 2, January 12, 1968, p. 22.

毛共與印共

註⑳Peking Review No. 45, Nov. 8, 1968, p. 23.

註㉑一九七三年胡佛研究所出版之「國際共黨年鑑」。

註㉒Liberation (Calcutta) Vol. II, No. 7, p. 119.

註㉓Peking Review, No. 44, Oct. 31, 1969, p. 26.

註㉔The Statesman, Oct. 11, 1972.

註㉕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eves 1972.

註㉖“Indian Communism and the Peasantry,” Problem of Communism.

註㉗“China and Indian Commu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0, April-June 1972.

本所出版匪情叢書

- 一、共匪文教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二、共匪經濟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三、大陸知識份子問題論集 四十元
- 四、匪黨問題論集 四十元
- 五、從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 二十五元
——毛澤東思想探源
- 六、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 四十元
- 七、中共的文藝整風 六十元